



我决定离开上海返乡，并非悲情地逃离

□ 赵雨思

两年前，在地铁站把出租屋钥匙交给室友后，我们认真道别，祝福彼此未来皆顺。你留在上海，我回到家乡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

选择离开上海，并不是我在一瞬间作出的决定。最早萌生这个想法时，我便自问过几个问题：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？对于未来职业发展有怎样的期待？能否接受回到非一线城市的落差？平台、薪资、文化娱乐的丰富程度，这些当然都是制约我作出选择的因素。然而，机缘巧合之下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我不得不在家乡远程办公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家乡发展得很快，过去让我纠结的种种差距也缩小了很多。

作为家里的独生女，我的决定自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。但扪心自问，要作出真正忠于自己的选择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北上广深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羡慕的标签。孩子在哪儿上班啊？上

海。上海好啊！大城市。这样的对话我经常听到。怀揣梦想在大城市而奋斗，努力便能成功，似乎是命运的许诺，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激昂、充实。相比之下，返乡则常常被认为是“追梦”的反面，意味着选择安逸、平稳，因此才会被冠以带有失败意味的“逃离”之名。

在这套话语下，中国的地域划分，仿佛只有一线和非一线的极致对立，是中心和边缘的简单二分。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样态，则很难被大众看到。一个个年轻人的境遇和自我需求被标签遮蔽，在大城市工作好、薪酬高，仿佛是幸福与否的准绳。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奔跑，按着规划的路线，难以脱离，身不由己。

在大环境的包围之下，个人很难不被这种单向度的成功观影响，过去的我也不例外。我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，又攻读了研究生，回家是不是屈才？好不容易从家乡走出去，为什么又要回来？大城市教育好，是不是要为下一代考虑？现在回到家乡的我，

不时依旧会听到这些质问的声音。

其实，在不同的选择之间，没有太多需要争辩的内容。生活这件事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同时也充满了“外面的人想进去，里面的人想出来”的一座座围城。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，我并不后悔一毕业就去了上海，在这个开放的大都会里，我感受到了现代化的便捷，以及人生的多元可能。魔都这个称号十分贴切，在这里仿佛一切都不稀罕，每一种独特性都可以被包容。选择上海，除了毕业时有合适的工作机会，还有之前到上海游玩时种下的“在这里生活”的想法。至于究竟适不适合，只有自己去经历过才知道。

在豆瓣，有个名叫“拜拜啦一线城市”的小组，简介里有一句话：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栖息地和生活。小组有“桃后生活”正在桃梨“原地挣扎”三个板块，处于不同阶段的人们在这里分享着各自的境遇。

其实，寻找答案的过程何尝不美妙？小组里的一篇热门精华帖来自一位从北京

到成都重新开始新生活的网友。在贴文里，他把为何选择成都这个想法的诞生、执行和落地的历程，包括在成都落户、找工作和买房的过程都做了总结，从最开始有离开的想法到真正到成都生活，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三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越来越明白，自己想要什么，新的城市可以给他什么。

我相信：你的心在哪儿，你的宝藏就在哪儿。最近，一个工作日的晚上7点，我约了发小去尝一家新开的酸汤牛肉。市井长巷，聚拢来是一番烟火。老板，有位置没得？有，几个人嘛？回到家省会的我，与朋友相聚的时间明显变多了，想起之前和住在上海另一个区的朋友约的饭，到最后离开都没有吃上。这周听妈妈说，家里河边的樱花开了，我便订了周末回家的票。

保罗·科埃略笔下的牧羊少年日思夜想，一生追求的宝藏不在别处，就在故乡教堂废墟的无花果树下。离开一线城市并不是什么悲情故事，也不需要“逃离

来”形容。反过来说，留在一线城市也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，一定会被工作压榨到毫无生活。

我想，对普通人而言，最重要的永远是内心想要的与当下的选择相符合。如果想要改变，那就忠于内心去尝试吧。深思熟虑之下，在对职业、家庭和自我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，值得一步步认真执行。回过头去，我会告诉那个毕业后去上海工作的自己：去经历吧，没什么不好的。并对选择回到家乡的自己说，你很勇敢，但这只是新的一站，未来也无需给自己设限。

比起镶金边的履历，挫而不折的强大内核无可复制



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

为自己打工，就是为未来打拼

□ 李少波

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，选择灵活就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既有客观的外部环境因素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年轻人择业观念的转变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很多年轻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就业之路。直播主播、电商运营、电竞选手、视频剪辑、Up主、知识付费服务提供者，这些灵活就业者，与个体商贩、农民工、外卖骑手等传统的灵活就业者存在着很大差别，他们更多地依靠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便捷，依靠网络流量带来的“爆炸式”传播效果。

这些新型的灵活就业方式，不同于传统行业的就业形式，无需上下班，甚至无需依托特定的单位。每一个灵活就业者，都可

以把自己变成“用人单位”，为自己“打工”，为自己的事业打拼。灵活就业市场已经形成了日益成熟的业态，变得更加完善，也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，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。

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择业观念更加多元，在做职业规划时更加自信，更加听从自己的内心，追逐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。另一方面，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包容，观念上的成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所打消。

当然，与“旱涝保收”的传统就业形式相比，灵活就业缺少了很多隐性的保障。灵活就业者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。

以我个人为例，我从一家大型私企离职之后，做了两年多的自由职业者。在这期间，我主要是做自由译者，利用从业数年时间积累的客户资源，基本可以保障所得收入能够维持生活需要。另外，我也会不断开发新的客户，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客

户暂时没有翻译需求时，跟另外一客户合作，避免出现较长时间没有客户合作的空窗期。同时，我还兼职自由撰稿人，为一些媒体和杂志撰写文章，赚取稿费。

换言之，很多自由职业者都会面临着个人业务的旺季和淡季。在旺季时，要把握住机会，用心收获一番，为自己接下来的路积累足够的资本。而在淡季时，难免会出现焦虑，被一种巨大的危机感笼罩着。这个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沉淀下去，丰富和提升自己，培养和打磨核心竞争力，迎接甚至创造下一个“旺季”。对于灵活就业者而言，灵活的只是就业方式，而稳定牢固的则是他们能把事情做好的实力。任何形式的自由背后都有一定的代价，对于自己所珍视的自由，他们更懂得全力以赴。

工作是重要的，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。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以什么方式来养活自己，而是以什么方式来找到和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过上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。

疫情之下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正经历着一个不一样的春招季，但不管在什么时候求职，不变的是激烈的竞争、纠结的选择。毕业以后，是寻求一步一个脚印的安稳，还是工作想换就换的自由？是留在大城市，怀揣梦想奋斗拼搏，还是回到家乡，扎根基层？这些年，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被更多人接受，为自己打工成为新时尚。不管怎样，选择一种就业方向，就是选择一种人生，有得到，也有舍弃。人生在每个地方都能发光彩，只要你努力和坚持。

□ 汪之岸

选择公务员的职业，和我个人经历有关。我在江南长大，十七八岁就去成都上学，读研又跑来北京，中途在台北、波士顿等地方交换留学，一直是匆匆忙忙地走马观花。青春就是好奇地张望，想看山看水，然后想看更远的山、更深的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向往暖烘烘的市井生活，选择能落地的稳定幸福。

毕业找工作那年，同学们都仿佛经历了一场兵荒马乱，我也不例外。当时报考了北京市定向选调和中央选调，选调生考试进面试的机会更多，面试分值占比更高，更看重应届毕业生的综合素质。央选和国考因为在同一天笔试，只能选其一，所以就没有挤国考千军万马的“独木桥”。而北京市定向选调的时间远早于央选，我是在即将和北京市签约的时候，才得知央选的笔试成绩。

更戏剧化的是，一边是央选的笔试成绩远超预期，另一边是北京定选的结果公示后必须立马签约，否则就得放弃，我犹豫了。只记得，北京那晚的车流一闪一闪地从我面前飞过，像冰冷的流星，马路对面是橙黄色的万家灯火，我就一直站着，脑补各种可能。想来想去，找工作实在太紧了，任何考试都带着不确定性，不如见好就收。于是，我就和央选报考的单位取得联系，决定主动弃权，替补上一位考生。就这样，我在第一场笔试、第一场面试之后就结束了求职之路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内卷并不可怕。一旦你想要追逐什么，必然会面临巨大挑战，这种比较是无处不在的。如何整理好“卷”带来的焦虑和无力感，是我们这代人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。比起镶着金边的履历，在无数挫败面前依旧生生不息的强大内核才是不可复制的。

那么，真实的选调生活是什么样呢？入职大半年的我总结了三大特征：一是零距离的众生相。我主要负责所在街道的宣传工作，需要对接各大媒体。有次记者要来拍居民搬家，我就纳闷了，搬家有什么可报道的？后来才知

道，拍摄对象是一位典型的“空巢老人”，平时特别孤独，只能以捡垃圾为乐。于是，自己住一套房，还有另一套房用来囤废品。慢慢地，捡来的废品一间房子也放不下，只能堆到楼道，占用了社区的消防通道。附近住户对此十分不满，不断投诉，街道和社区想出各种法子调解，终于把老奶奶视如珍宝的“藏品”全部拖走。

二是群英荟萃的社区工作者。你以为社区工作者都是大爷大妈？那就大错特错了！我日常工作接触到的社区书记中就不乏形形色色的各路“大佬”：有川大高分子专业毕业的高材生，有退隐江湖的东北“倒爷”，还有陪都媳妇没想到自己一举夺魁的天选之子。报考社工的有早稻田大学回国的大哥，有西班牙学歌剧的小姐姐，城管队伍中还有退役的全国跆拳道冠军。我逐渐发现，成长的路径其实并不单一，色彩斑斓的鲜活人生同样滚烫。

三是永远在路上工作节奏。基层工作当然忙，加班加点都很正常。为创建卫生城市，大夏天我们背着垃圾袋捡草从里的易拉罐、塑料袋；为宣传疫苗接种，我们挨家挨户敲门拜访，遇到不理睬的居民劈头盖脸挨一顿骂；大规模核酸检测，我们必须穿上全套防护服，不敢喝水也不敢上厕所，在蓝色的棚子里给大家扫码、发试管。过年也没法放假，我所负责的社区有居家观察的住户，社区书记提前准备了好饺子挂在门把手上，顺道还给换春联、贴福字，隔着大门送上喜气洋洋的祝福。

经过这段时间的基层工作打磨，我开始对现实世界有更深入的思考。人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认知能力的提高。比如在基层治理层面，单拎出一个社区来讲，它的力量资源是非常薄弱的，但这个小小基层肩负的责任却十分重大：上到人命关天的治安问题，下至小区停车难、垃圾没处扔等民生小事，都是棘手的“疑难杂症”。这时候，共建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。

我是北师大毕业的，所以很了解象牙塔的年轻人有多么“好面子”。然而，光芒万丈的学历并不创造长久的个人价值。一个人的成长，需要平静接受生活的粗糙和磨炼，而不是机械功利地堆砌“优秀”。

编成功上岸后带来的那种“光环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也许他们赚的也不多，但当提到是在财政局、银行上班时，还是会被夸奖。我认为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其实是北上广和三四线城市中，两种不同年轻人殊途同归的走向。

工作期间，我经历的面试也是不计其数。其中，最让我头疼的问题，不是面试官对业务能力的考察，而是HR的灵魂拷问：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？每次，我都要堂而皇之地编排一份看上去很美的规划。而我内心又特别想反问HR一句：你真正的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吗？很多时候，不是不想去做规划，而是我深刻认识到，工作中日复一日的重复感和倦怠感，以及随时可能产生的重大变动，都使我感受到规划的局限性。

跳槽这么多次，对工作选择问题，我并不能算完全想明白。比较能确认的一点是：自己在过往的经历中有了定积累，逐渐明晰了工作的兴趣点所在。未来，不论在职场中遇到什么变化，我都会积极应对，乐观对待工作和生活。

□ 白羊

大学毕业五年，我经历了五份正式工作，最长的两年半，最短的五个月。我想，自己的跳槽经历，可能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2017年，我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，入职一家著名电视台，负责做艺术公关和策展工作。这第一份工作，就偏离了自己毕业时想做一档优秀节目的初衷。之后，我因机缘巧合进入互联网行业，游走其间，做过内容策略、内容运营，也当过新闻编辑。提笔写下这篇文章时，我即将奔赴下一家单位入职。

不止一次有人问我：为什么不在一家公司好好待着，脚踏实地积累，然后慢慢寻

找上升的机会？很多时候，我也在反思：是不够安分吗？或许吧。但是，很多时候，跳槽真的是有各种原因的。

比如，第一次决定换工作，是因为当时的业务有较大变动，同之前的工作期望发生明显偏移。第二次跳槽，则是当时参与的几个项目已经进入稳定期，接下来的很长时间，可能每天需要的只是机器般的重复，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状态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，我也意识到继续下去可能不会让自己有新的收获。而且，此时工作已两个多月，我消费欲大增，涨薪是当时很大的一个诉求。甚至这次跳槽时，涨薪的诉求已经排在了对工作岗位要求的前面。

第三次跳槽来得较为突然，当时正值组里裁员，领导正为裁谁而烦恼，于是开始私下打听有没有人最近在看机会准备走人

的。结果组里一个同事竟跟领导和HRBP说我最近在找工作。半年前我跟这位同事出差时，确实有提到面试过一家心仪的公司，没想到这事被他抖落出来。事实上，如果按绩效排名的话，裁员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，可这件事却让当时的自己陷入巨大的被动中。最终，我选择离职。

第四次跳槽，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2022年新年刚过，似乎周边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，本人很不幸成为其中一员。被裁员的原因有些离谱：组里必须走一个，而还在试用期的我成了那个“必走”的人。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。难过的不是被裁员，而是生活节奏被彻底打破，因为我可能又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找工作，去适应新的工作氛围。而每一次找工作，那种等待通知，准

备一次又一次面试的过程，真的对一个人消耗非常大。

看吧，跳槽这么多次，当别人以为你潇洒快意，工作想换就换时，只有自己才知道其中酸楚。这几年，大家对互联网大厂的关注热度不减。相对较高的住房补贴，足额缴纳的五险一金，丰富的三餐和下午茶，辗转了这么多家互联网公司，我也会想：对年轻人来说，大厂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作为过来人，我觉得大厂赋予员工的一份骄傲“光环”是不容忽视的，哪怕它是虚幻的。在和朋友聚会、外出旅行时，常常会被进行自我介绍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说出自己是某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时，别人真的会另眼相看，即使你的收入并不算高，他们对你从事的工作也并不了解。

我总觉得，这一点和老家同学考公考

